

# 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

方 博

**摘 要** 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另辟蹊径的阐释在论证上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除了学生时代的短暂邂逅之外，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一直保持着自觉的批判态度，并自觉清除其思想中可能的浪漫主义要素。他与德国浪漫派在一些观念上的相似性，与其说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不如说源于相同的时代问题。他们共同面对这些问题，但分别给出了各自的诊断和处方。鉴于双方在基本方法和基础信念上的根本差异，不能因为这些观念的表面相似就轻率断言马克思受到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或者批评他沾染上了浪漫主义的弊病。

**关键词** 马克思 浪漫主义 自由 审美 幻想

DOI:10.19862/j.cnki.xsyk.000361

作者方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2)02-0015-12

德国哲学被公认为马克思学说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但在通常的阐释中，这一判断里的德国哲学所指的主要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论传统以及作为黑格尔哲学后继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而在这之外的德国浪漫派实际上长期不在主流阐释的视野之内。近些年来，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始强调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的影响。从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主张马克思与浪漫派有思想关联并非完全没有理据。在马克思的成长时代，浪漫派在德国是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潮，甚至在文学、艺术、现实政治和民族性的塑造等方面对德国的影响可能比德国唯心论哲学还要大。马克思在学生时代的确与浪漫派有过直接的接触，而且他后来的一些亲密朋友，比如卢格和海涅，都是浪漫派的重要批判者。因此泛泛地断言马克思与浪漫派有思想关联毫无问题，但要判断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具体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则要困难得多。困难一方面当然来自对思想史上的观念关系进行精确认定的难度更大，但另一方面则来自被笼统称为德国浪漫派的庞大集合内部的思想异质性及其与德国唯心论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柏林将康德和费希特等人一概归入浪漫派的做法丝毫无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厘清和解决。<sup>①</sup>

本文的关注点在马克思，而非浪漫派，因此对浪漫派的界定将主要从马克思的角度出发。在此意义上，不仅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甚至是谢林也不被纳入浪漫派的行列，虽然他与浪漫派之间的确共享了不少极为相似的基础信念。<sup>②</sup>出于同样的原因，本文也不会严格区分德国早期和后期浪漫派的思想。虽然当代的研究极力揭示这两者之间的深刻差别，但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些差别未必已经进入了公共意识。拜塞尔就指责海涅和卢格对浪漫派的批判犯了时代错乱的错误，即将早期和后期的浪漫派混为一谈。<sup>③</sup>鉴于

<sup>①</sup> 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四、五章。

<sup>②</sup> 关于谢林与浪漫派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可以参考先刚：《谢林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吗？》，《世界哲学》2015年第2期。

<sup>③</sup> Frederick Beiser,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 179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24.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曾经花费过更多心力去深入研究德国浪漫派,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他对后者的内部区分与海涅和卢格相比会有多么重大的差异,甚至对马克思而言,这样的区分可能并无必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多数强调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的当代研究者也犯了时代错乱的错误,即将当代研究在同情视角下才发掘出来的德国浪漫派的某些思想要素,甚至是进步的、革命的浪漫派形象<sup>①</sup>,当成了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可以轻易获取的公共知识,进而论证它们对马克思的影响。

本文的基本判断是: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德国浪漫派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没什么重要影响,相反,马克思有意识地抵制一切浪漫主义的东西。因此本文将主要关注这一问题:基于马克思自己所表达的对浪漫派的几乎全然否定的批判立场,如何回应那些强调浪漫派对马克思的影响甚至试图将马克思的思想予以浪漫化阐释的主张?为此,我将首先考察青年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的短暂邂逅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觉批判,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强调浪漫派对马克思思想有重要影响的几种代表性的阐释提出反驳,最后我将处理一个基于外部视角的批评,即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也包含着他所批评的浪漫主义的要素。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当遭遇理论上的困境,他有时候的确会不自觉地陷入浪漫主义,但随着理论范式的突破,原先的浪漫主义也随之消失。而马克思的思想中也的确有一些可能与浪漫派同源的观念,但他对此有清醒的意识,并自觉消除这些观念的浪漫主义基底。

## 一、马克思对浪漫派的批判

马克思是在一种以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为主的智识氛围中接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学教育,这种影响清楚地反映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之中,但这一精神状态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延续到他的大学时代。可能部分因为与燕妮的热恋,部分因为波恩大学的浪漫派氛围,马克思在大学第一年就坠入了对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的狂热之中。他在第一学期选修的六门课程中就有三门文学课,并在两个学期中连续选修了大施莱格尔(A. W. Schlegel)讲授的“荷马问题”和“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在此期间,他给燕妮写了很多情致缱绻的诗歌,并尝试创作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里面充满了浪漫派的各种惯常意象,诸如精灵、海妖等。马克思的这一精神状态直到被父亲强令转学到柏林大学一段时间之后才有所转变。在1837年11月写给父亲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他描述了对此前的诗歌创作和精神状态的自我反思:

对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观念和我迄今为止的整个成长过程。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如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非常遥远的彼岸。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抨击,漫无边际,异常奔放的感情,毫无自然的东西,纯粹的凭空想象,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不过或许也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奋发向上的追求,——这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本诗集的特点。<sup>②</sup>

在这段话中,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对立这一将长期困扰马克思的问题第一次被表达了出来,但它尚未包含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和社会关切。沉湎于浪漫主义的马克思并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议题,就像麦克莱伦所指出的,马克思的那些诗歌“包括了德国浪漫主义的,除政治上反进步和民族主义之外所有的著名主题”<sup>③</sup>。恩格斯在1892年9月28日写给梅林的信中也说过,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期间读过亚当·弥勒和冯·哈勒的国家学著作,但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sup>④</sup>对那时候的马克思而言,浪漫主义所导致的是在情感(“爱情”)、创作(“艺术”)和精神追求(“天国”)等方面与现实生活的疏远,这意味着主观臆想和不确定性。马克思声称他曾拿浪漫派的理想主义(Idealismus)和康德、费希特的唯心主义(Idealismus)

① 关于反动与进步的德国浪漫派的辨析,可以参考 Ludwig Marcuse, “Reaktionäre und Progressive Romantik,” *Monatshefte*, Bd. 44, Nr. 4/5 (Apr.-Mai 1952), S. 195-20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③ 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8页。

作比较,这说明他对二者是有区分的意识的。但他在对康德法哲学体系的模仿中同样自行领会到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空洞的形式主义和永久的应然<sup>①</sup>,“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对立”至此才真正具有了政治意义。马克思因此进一步转向了黑格尔,他也将自己从浪漫的理想主义向黑格尔哲学的这一转变描述为“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并声言:“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sup>②</sup>这表明,将马克思与浪漫派在诸如关注现实和批判现代市民社会等议题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回溯到他在学生时代对浪漫派的浅尝辄止,非但毫无根据,反而可能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真实过程的一个颠倒。

除了学生时代的这一短暂邂逅之外,浪漫派再也没在任何时候构成过马克思思考的重心,虽然他在探讨其他主题的时候偶尔会顺便提到与之相关的浪漫派的思想。在一封写于1842年3月20日的信中,马克思告知卢格他要写一篇论宗教艺术的文章,并“写出一个论浪漫派的结尾作为附录”。而在4月27日的信中,他宣称四篇在内容上相互联系的文章已经几乎脱稿,包括《论宗教艺术》《论浪漫派》《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和《实证哲学家》。<sup>③</sup>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其中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在马克思眼里,如果说“胡果就是还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的自然人”,那他在《莱茵报》时期主要的理论对手就是被“浪漫派用幻想修剪”过的历史法学派。<sup>④</sup>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当然也可以被视为对浪漫派的批判,所以他才会在《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一文中宣称,《莱茵报》所发挥的作用之一就是“反对浪漫主义思潮”<sup>⑤</sup>。但对浪漫主义的反对显然并非最终目的。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莱茵报》,批判的矛头最终指向的是由当时的普鲁士法律修订大臣萨维尼所主导的反动的和封建的立法。而在此之后,浪漫派更只是间或出现在马克思的某些句子或段落中,甚至都不再构成任何章节的主题。

但即使终身保持着对文学的强烈兴趣,“浪漫派”或“浪漫主义”这些表述在马克思的笔下几乎从未有过正面的意义,这甚至能与他对谢林的偶尔肯定的评价形成对比。洛维极力论证浪漫派对马克思的影响,而他所能找到的马克思对浪漫派有所肯定的最有力证据,无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关于以瑞士人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sup>⑥</sup>洛维认为,这表明马克思明确地承认了他在智识上受益于浪漫派。<sup>⑦</sup>洛维对浪漫派的界定当然要比本文所界定的德国浪漫派宽泛得多,不仅包括卡莱尔和西斯蒙第这些后来被认为属于广义的浪漫派阵营的作家,甚至还包括历史人类学家毛勒、摩尔根等人,似乎所有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趣和研究都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马克思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了解并非来自德国浪漫派,他也不用浪漫主义去称呼其中的反动思潮。当然,从外部视角来看,《共产党宣言》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某些描述,包括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评价,的确比较接近浪漫派的思想。比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sup>⑧</sup>。而封建的社会主义则“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7—1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7、28—2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23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7页。

⑦ Michael Löwy, “Marxism and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Telos*, Vol. 49 (1981), p. 88.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7页。

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sup>①</sup>。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对比马恩此前的独立著述的话，会发现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措辞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评价可能会稍留余地，例如，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如此评价“青年英国”（在《共产党宣言》中被视为封建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青年英国’的目的是恢复昔日‘美好的英国’以及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勇敢地起来反对现存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见，有勇气承认现存制度下的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sup>②</sup>这段引文的前一句与我们前面所引的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批评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修辞上也是比较相近的，马克思当然会同意这样的批评。但后一句所表达的有所肯定在马克思自己独立撰写的与浪漫派相关的文本中则几乎不可能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还将西斯蒙第对现代工业的批评称为纯粹的幻想：“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离开庸人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小市民的、‘[自]制的’平庸的狭隘眼界；虽然如此，它们仍然不失为纯粹的幻想。”<sup>③</sup>洛维对马克思主义与浪漫派关系的很多论述，实际上主要指向的是恩格斯，但即使是恩格斯，也不会同意他和马克思对现代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分析受益于浪漫派，正如他在给梅林的信中所说的：“这种极力把唯物史观的发现归功于历史学派当中的普鲁士浪漫主义者的主张，对我来说确实是新闻。”<sup>④</sup>

马克思对浪漫派以及浪漫主义的理论品格的批判几乎没有任何保留，他既不会认为浪漫派的理论诉求里包含值得肯定的道德内容，也不太可能会认为他们能够“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就像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我们可没有。他们总是把土地的买卖中的卑鄙行为同土地私有权的买卖中包含的那些完全合理的、在私有制范围内必然的和值得期待的后果混为一谈。”<sup>⑤</sup>在马克思看来，浪漫派在基本的认知方法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所以并不能把握现实的矛盾关系。在他的笔下，与浪漫主义式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是诸如“幻想”（Phantasie）、“臆想”（Einbildung）这样的词。正如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所说的，在“浪漫主义的不确定性、敏感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的激昂情绪”中，“外在的偶然性已不再表现为它那种实际的确定性和局限性，而表现为某种奇妙的灵光、表现为某种虚构的深奥和壮观”。<sup>⑥</sup>即使是在关注人的现实需求的政治经济学中，浪漫派也无法把握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及其包含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浪漫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仅仅是情绪化的反动，它是封建土地所有者的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层次上远远低于以李嘉图和穆勒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借对奢侈和节约问题的讨论引出了这一对比：“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不过是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家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sup>⑦</sup>而《资本论》中对弥勒的批判则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浪漫派所谓关注具体现实的方法的不屑一顾：“我们这位弥勒所用的方法，具有一切行业的浪漫主义的特征。它的内容是由日常的偏见构成的，是从事物最表面的假象取来的。然后，这种错误的平庸的内容被用神秘的表达方法‘提高’和诗化了。”<sup>⑧</sup>

但马克思显然也不会像后来的卡尔·施米特那样，认为浪漫主义仅仅是将一切都当作审美契机的主体化的机缘论。<sup>⑨</sup>相反，在他看来，在浪漫派的各种诗化和审美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个不变的内核，即对前现代社会尤其是对封建制度的颠倒黑白的美化。这种美化在已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法国表现为反革命和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4—5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3—49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3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8页。

⑨ 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复辟的思想，而在仍然部分停留于封建制度之中的德国则表现为对现行的反动秩序的维护，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历史法学派和德国浪漫派的基本政治立场。可能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马克思对他所认为的与浪漫派相关的人与事的批判绝无保留，浪漫派在他看来根本上就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自由之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充分表达了马克思的愤怒：“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有个学派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鞭子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鞭子——的每一声呐喊都宣布为叛乱。”而接下来一个稍显和缓的评价更是直接针对浪漫派的：“那些好心的狂热者，那些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历史。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sup>①</sup>但在这段话里马克思不仅嘲笑了这些人对过去的幻想和虚假的自由意识，“野猪的自由历史”也指向了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里曾批判过的“精神的动物王国”：“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因为这种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而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封建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它和有区别的人类世界相反，因为后者的不平等现象不过是平等的色彩折射而已。”<sup>②</sup>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法学派和浪漫派的差别，仅仅是没有慰藉没有幻想的锁链和缠绕了鲜花的锁链的区别。在革命与复辟的二分法之中，他不太可能会接受一个进步的、革命的浪漫派形象。浪漫派是对启蒙思想的反动，在此意义上，它的确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这一反动的结果是向封建制度的倒退，因此在浪漫派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看到的的就是当前的基督徒兼骑士的，现代兼封建的，简言之，即浪漫主义原则的众多代表之一”<sup>③</sup>。

## 二、对几种肯定阐释的反驳

以上的分析表明，马克思本人对德国浪漫派采取了一个毫无保留的自觉批判态度。即便如此，仍然有阐释者试图从内部阐释的视角，即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和表达为依据，去肯定浪漫派对马克思的正面影响。

最为激进的阐释立场是将马克思解释为一个浪漫主义者，这以维塞尔为代表。在《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一书中，维塞尔宣称马克思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本质上是变形的诗歌，其无产阶级的‘发现’，即科学社会主义庞大体系的关键要素，是受到马克思早期（1836—1837）诗歌兴趣的极大推动”<sup>④</sup>。他由此以浪漫派的反讽概念为切入点，去分析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并得出结论：“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中，人们能够很容易认出一个‘神话学形象’，尽管这是懒散的、退化的、隐蔽的神话学形象。”<sup>⑤</sup>我国学者刘聪在她的专著中完全接受了维塞尔的结论，并对此进行引申，力图更为全面地审视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的关系，以“还原一个真实而完整的马克思”。<sup>⑥</sup>但在维塞尔的阐释中，“马克思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与其说是他的结论，还不如说是他的前提，他并没有证明这个前提。维塞尔实际上也承认这一点：“对青年马克思而言，这些诗歌是关于人的现实本质有意义的叙述，这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诗歌应该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关键。接下来对马克思诗歌的研究，可以视为就后一种可能性而提出的看法。[...] 如果我的论点是对的，那么，理解马克思的诗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sup>⑦</sup>但即使从这样一个假定的前提出发，维塞尔对马克思的阐释在细节上也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论证，而是充满了各种猜测和臆想。维塞尔当然不会没注意到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对自己思想转变所作的陈述，他也承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1—20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2页。

④ 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⑤ 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第251页。

⑥ 刘聪：《通往“蓝花”的深处——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⑦ 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第6页。

认马克思在这封信里“不仅宣称他在浪漫主义的诸神中失掉了信仰，而且宣称他转意归向黑格尔哲学”。但他为自己的阐释给出的解释是，因为黑格尔最终也无法解决应有之物与现有之物的对立问题，所以马克思必定也要背弃黑格尔哲学，他因此断言马克思再次“转向了浪漫派的哲学观，即转向了作为反讽的辩证法的哲学”。但维塞尔对此并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论证，相反，他的论述里充满了诸如此类的猜测：“人们不知道马克思到底读了多少施莱格的书。马克思可能已经从某些人，诸如黑格尔、索尔格，甚至间接通过海涅而得出了关于施莱格和反讽的想法。”<sup>①</sup>在双重意义上，维塞尔对马克思的阐释的确是一种浪漫主义的阐释：他不仅用浪漫主义来阐释马克思，这一阐释本身也是浪漫主义的。

另一种相对和缓的阐释立场并不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主张浪漫派在内容上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例如，布雷纳斯认为，马克思在1840—1850年间，“达到了对浪漫主义的和启蒙—功利主义的社会批判潮流的融合”<sup>②</sup>。其他一些人则不满足于这种含糊的描述，试图进一步将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关系纳入辩证关系之中予以更精确的解释。比如，我国学者何中华认为，浪漫主义构成了启蒙主义的反题，马克思的思想则进一步构成了两者的合题。<sup>③</sup>这种解释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马克思眼中，浪漫派在理论层次上是低于作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启蒙思想的。在一般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浪漫派是对启蒙思想的一个反动（Reaktion），但反动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构成辩证法意义上的反题（Antithese）。鉴于正题、反题和合题并非意义明确的逻辑范畴，我们需要明确浪漫派作为反题所对应的范畴。如果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提到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来理解的话，浪漫派只是对现代社会的情绪化的反动和逃避，它本身并没有能力揭示现代社会关系的真正矛盾，因此并无资格充当启蒙思想的反题。正如马克思所言：“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sup>④</sup>何中华认为，浪漫派高于启蒙思想之处是它的历史性意识，并认为浪漫派在向封建制度倒退方面“背叛了自身的历史意识”<sup>⑤</sup>，似乎浪漫派就其自身的思想方法而言应该是进步的，在马克思看来弥漫于浪漫派之中的对过去的美化和推崇反倒是无关紧要的错误。如果浪漫派凭借其历史性意识得以充当启蒙思想的反题的话，那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似乎只有借助黑格尔经常使用的“抽象、具体和绝对”的范畴才能获得理解。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不仅启蒙思想必须被视为单纯的抽象普遍性，为了把具体范畴留给浪漫派，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也必须被否定。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何中华不仅批评康德对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的弥合缺乏历史的力量，还依旧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不过是充当了检验逻辑的工具”。<sup>⑥</sup>可惜这种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片面理解现在基本上已不再被主流的阐释所接受。<sup>⑦</sup>而浪漫派所谓关注具体现实的方法，正如前文所引马克思对弥勒的批评所表明的，能得到的只是“错误的平庸的内容”，它并无资格作为启蒙思想的反题占据具体范畴的位置。

还有一种试图在辩证关系中解释马克思与浪漫派关系的思路不是将浪漫派视为反题，而是视为肯定的正题，这以洛维为代表。在洛维看来，浪漫派的确代表了一个前现代的立场，但它所对应的并非封建社会，而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洛维试图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对毛勒和摩尔根著作的兴趣来证明，原始社会代表了一个马克思也有所肯定的过去，并构成了通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正题。<sup>⑧</sup>

① 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第134、163、164页。

② Paul Breines, "Marxism, Romanticism, and the Case of Georg Lukács: Notes on Some Recent Sources and Situations," In: *Studies in Romanticism*, 1976 (16), p. 475.

③ 何中华：《马克思的历史地思与浪漫主义》，《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5页。

⑤ 何中华：《马克思的历史地思与浪漫主义》，《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⑥ 何中华：《马克思的历史地思与浪漫主义》，《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⑦ 贝克：《费希特和康德论自由、权利和法律》，黄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27页。

⑧ Michael Löwy, "Maxism and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p. 88.

但这一阐释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错乱：在获知原始社会的历史存在之前，马克思早就发展出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兴趣只是为了补充他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知识，而他对共产主义的推导以及后续的修正，既不依赖于原始社会的历史存在，也不依赖于对这一存在的理论假定。甚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展现的异化历史在逻辑上也无需假定一个时间上在先的非异化状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异化的劳动这一概念所表明的并不是‘自然人’（没有被异化）与‘社会人’（被异化的）之间的张力，而是表明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所蕴含的潜力与这种潜力实现之不可能性之间的张力，把人与动物分开的并不仅仅是由于人与其他物种之间存在生物性的差异，而是人类社会长期进步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成就。”<sup>①</sup>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实证的历史科学绝不容忍对历史的任何浪漫主义态度，马克思因此不可能接受对过去的社会形态的推崇，即使是一个尚未产生阶级和剥削的社会。《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这段话表明了马克思的态度：“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这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sup>②</sup>即使马克思那时候尚未获知原始社会的历史存在，但这段话仍然可以适用于原始社会：在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的虽然平等但极度简单的社会关系绝不代表一种合理的关系，它也无法为未来真正的共同体提供可供参考的组织形式。相反，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才能“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sup>③</sup>，而这是单纯留恋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丰富性或原初的非异化状态的浪漫主义观点所无法把握到的。资产阶级观点与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是囿于个体主义之内的对立，它们都无法超出个体性把握到现实发展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塑造作用，这一对立没有任何辩证法意义。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对辩证法的滥用，实际上是一种逻辑神秘主义。

因此最后一种，可能也是最为可取的阐释策略便是，不再从理论整体上去断定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关系，而只在具体的观点上去发掘浪漫派对马克思的影响。基于对浪漫派的不同理解和各自的论证需要，不同的研究者会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其中甚至会有一些相互对立的主张。比如莱文认为，马克思受到了浪漫派的保守主义的影响，因此相对于激进的个体主义更为强调“社会条件所施加于政治行动的限制”<sup>④</sup>。与之相反，古德纳则认为，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主要来自与浪漫主义相对的古典主义，马克思真正受到浪漫派影响的是“斗争、个体承诺和努力，以及阶级团结和革命意志”<sup>⑤</sup>。我国学者刘森林则从关注现实方面强调马克思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继承、批判和超越。<sup>⑥</sup>这些研究表明，在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之间的确存在一些至少是表面相似的观念。就这些观念作外在的比较是有意义的，但要在理论上证实浪漫派对马克思的影响，不仅缺乏直接的文本证据，甚至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也未必能够成立。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会承认，马克思和德国浪漫派在基本方法和基础信念方面都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这些观念上的相似性可能来自他们共享了那个时代德国思想界的一些共同议题，比如对启蒙的批判、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和对历史性的强调，而在马克思之前，这些议题也并不专属于浪漫派。如果将某些单独的观念从浪漫派的理论整体中切割出来，可能会与马克思的某些主张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些主张是受了浪漫派的影响，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有句谚语说得好，某些动物偶尔也会发现一颗珍珠；而在普鲁士的浪漫主义者中，这样的动物比比皆是。”<sup>⑦</sup>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即使不考虑浪漫派的直接影响，就像主流的

①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理论》，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2页。

④ Michael Levin, "Marxism and Romanticism: Marx's Debt to German Conservat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 22, No. 2 (1974), p. 406.

⑤ Alvin Gouldner, "Romanticism and Classicism: Deep Structures in Social Science," *Diogenes*, Vol. 21 (1973), p. 96.

⑥ 刘森林：《切入现实：马克思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批判和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39页。

马克思研究业已证明的，我们仍然可以解释以上所列举的那些观念是如何在马克思思想中产生的，而这似乎也更为符合马克思的自我陈述。莱文实际上也承认，他所论述的马克思从浪漫派那里获取的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也有系统的表述，因此他只是提供了一个补充的视角，而不对它们在观念史中的恰当位置进行定义。<sup>①</sup>刘森林为了证明马克思对具体现实的关注受到了浪漫派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文本证据，即马克思写于 1837 年的一句诗：“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刘森林认为，这“显示了他对抽象、不甚关心具体事物的观念论哲学的不满”<sup>②</sup>。但其实马克思在这首题为《黑格尔：讽刺短诗》的诗中，是以黑格尔的口吻讽刺黑格尔哲学与日常现实的联系过分紧密。<sup>③</sup>这恰恰表明，马克思对具体事物的关注并非源自他在学生时代对浪漫派的沉迷。当然，黑格尔哲学也不是驱使他去关注现实事物的直接动力，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坦白的，《莱茵报》时期“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才是真正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sup>④</sup>

### 三、拒斥浪漫主义

我们当然不是要否认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有所影响，要证明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可能。以上的分析仅仅表明：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有充分自觉的批判，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证明后者对他的思想形成有重要的正面影响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在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的关系问题上，真正需要严肃对待的反倒是来自马克思研究外部的批评。这些批评并不关心马克思本人对浪漫派的态度，也无意从马克思的文本和经历中寻找证据证明其思想的浪漫主义根源，而是从外部的视角，尤其是从浪漫主义研究的视角，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中同样包含了浪漫主义的要素，甚至它的结构就是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在这里意味着消极的东西，它与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科学性相对立。比如，施米特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人民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再次成为真正的革命运动的执行者，它把自身等同于人类，把自身理解为历史的主宰”<sup>⑤</sup>。柏林则认为，德国人热衷于在我们之外寻找历史的决定力量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历史阴谋论，“人们总是试图寻找隐蔽的敌人，有时寻找更大而化之的概念，诸如经济力量、生产力力量、阶级斗争的力量（马克思就是这样），或是更为模糊、更形而上学的观念，诸如历史和理性的诡计等等（黑格尔就是这样）”<sup>⑥</sup>。

这一类批评的问题首先在于，浪漫主义研究视野中的浪漫派往往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思想集合，在这一视角下，18 世纪末之后的德国思想家很少能够免于被指责沾染上了浪漫主义，柏林认为康德也是浪漫主义者就是一个实例。甚至柏林本人也可能会因为他的反启蒙的价值多元论被施米特视为自由主义浪漫派，而施米特关于主权决断的政治神学则被萨弗兰斯基视为一种“主权的政治浪漫主义”<sup>⑦</sup>。基于外部视角的批评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往往过于空泛而缺乏对马克思思想细节的引证，因此除非从整体上反驳他们对浪漫主义的阐释，否则无法在论证上替马克思辩护。维塞尔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的浪漫化理解，实际上跟施米特很相似，但他更多地介入了对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细节的阐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讨论他的论证的得失。但这些外部的批评确实提醒我们需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本人对浪漫派有自觉的批判，他自己会不会在某个时刻也陷入了他所批判的浪漫主义？由此我们将会发现：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当遭遇理论上的困境，他有的时候的确会不自觉地倒退回浪漫主义，但随着理论范式的突

① Michael Levin, "Marxism and Romanticism: Marx's Debt to German Conservatism," p. 413.

② 刘森林：《切入现实：马克思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批判和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8 期。

③ 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 1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88 页。

⑤ 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第 90 页。

⑥ 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 109 页。

⑦ 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75 页。

破，原先的浪漫主义迷误也随之消失；而马克思的思想中也的确有一些可能与浪漫派同源的观念，但他对此有清醒的意识，并从一开始就摒弃了这些观念中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转向黑格尔哲学后，马克思第一次陷入浪漫主义是在《莱茵报》上讨论林木盗窃法的问题之时。这一问题的背景是：莱茵省议会有意通过立法将捡拾他人林木上掉下的枯枝的行为规定为盗窃。马克思从道德直觉出发强烈反对这一立法提案，“如果法律的这一条款被通过，那么就必然会把一大批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枝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sup>①</sup>。换言之，这不仅会使得一大批无辜之人变成罪犯，还会剥夺那些以捡拾枯枝为生的贫民的谋生手段，马克思因此没有采取将捡拾枯枝界定为民事侵权行为的辩护策略，而是极力论证这一行为本身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依据现代物权法原理，枯枝作为林木的天然孳息在权利上自然也应当归属于林木的所有人。马克思对此当然很清楚，他因此转而诉诸所谓的中世纪的穷人的习惯法，这种习惯法要求维持枯枝在权属上的不确定状态。习惯自身并不能证明法的合理性，马克思因此尝试为这一习惯辩护：“我们将会看到，作为整个贫苦阶级习惯的那些习惯能够以可靠的本能去理解财产的这个不确定的方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阶级不仅感觉到有满足自然需要的欲望，而且同样也感到有满足自己正当欲望的需要。”<sup>②</sup>但以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来论证法的合理性，这恰恰是他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批判过的胡果的方法：“对胡果的理性来说，只有动物的本性才是无可怀疑的东西。”<sup>③</sup>从诉诸中世纪的习惯法要求一种所有权的不确定状态开始，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接近了浪漫派的立场，而当他试图进一步论证枯枝与林木上的树枝在权属上的差别时，则完全陷入了浪漫主义：

自然界本身仿佛提供了一个贫富对立的实例：一方面是脱离了有机生命而被折断了的干枯的树枝树杈，另一方面是根深叶茂的树和树干，后者有机地同化空气、阳光、水分和泥土，使它们变成自己的形式和生命。这是贫富的自然表现。贫民感到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并从这种相似感中引申出自己的财产权；贫民认为，既然自然的有机财富交给预先有所谋算的所有者，那么，自然的贫穷就应该交给需要及其偶然性。在自然力的这种活动中，贫民感到一种友好的、比人类力量还要人道的力量。代替特权者的偶然任性而出现的是自然力的偶然性，这种自然力夺取了私有财产永远也不会自愿放手的东西。<sup>④</sup>

当树枝与树干相连的时候，它属于林木的所有人，而它一旦跟树干分离，就变成了无主物，造成所有权状态改变的并非权利主体的某个法律行为，而是大自然的友好的、人道的安排，这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这一倒退暴露了马克思的理论困境：在黑格尔的理性国家之中无法解决普遍贫困的问题，在坚持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制度的前提下，也无法为捡拾枯枝的行为进行理性辩护。马克思对此已有所意识：“贫苦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有的地位。”<sup>⑤</sup>这就是他所遇到的“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但他那时候还完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只能以浪漫的诗化来掩盖自身的理论困境。而当他洞悉了普遍贫困在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根源，并转向对现代社会的更基础的批判之后，这一立法层面的问题以及它的浪漫主义解答也就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被消解了。

马克思再次陷入浪漫主义是在他跟鲍威尔争论犹太人解放问题的时候。虽然《论犹太人问题》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同样陷入了浪漫主义。鲍威尔的基本主张是：在德国，犹太人除非能与基督徒一起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否则不可能获得解放。马克思则认为：鲍威尔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真正解放，即使犹太人并未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们也可以作为公民在政治国家中获得政治解放，只要德国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这样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页。

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因为在国家中，人——虽然是以有限的方式，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领域内——是作为类存在者和他人共同行动的；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sup>①</sup>问题是，如果人在市民社会之中是相互敌对的利己主义者，如何能够想象他们在国家之中会作为类存在者与他人共同行动？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来自黑格尔，但黑格尔为了保证政治国家能够超越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的对立，诉诸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的王权和官僚等级，以及立法中的中介要素，这些都是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这也使得政治解放的前提，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成了问题。马克思当然可以进一步诉诸现代国家的宪政，但正如鲍威尔所批评的：“宪政自由主义是享有优先权的人提出的体系，是有局限性的、有自身利益的自由体系。它的基础还是偏见，它的本质还是宗教的。”<sup>②</sup>在分裂对立的个人和群体中间，有什么力量能在宪法中规定人在政治上的平等？有什么力量能保证仅仅形式上拥有平等政治权利的公民在政治中不会陷入分裂对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评等级要素是“政治国家的浪漫幻想”<sup>③</sup>，但在《论犹太人问题》里，他自己也陷入了关于公民的浪漫幻想：“国家，特别是共和国对宗教的态度，毕竟是组成国家的人对宗教的态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他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与自身相矛盾，他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了这一限制。”<sup>④</sup>马克思对鲍威尔的一些批评当然是对的，鲍威尔将宗教对立当成人在现实中的根本对立，对宗教解放的可能性条件也缺乏认识。但妄想相互对立的市民在政治国家中能够摆脱利己主义，作为平等的公民追求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目标，这是公民浪漫主义。<sup>⑤</sup>这一思想的源头并非德国浪漫派，而是卢梭，卢梭曾试图通过公民宗教去解决公民的塑造问题<sup>⑥</sup>，这当然也是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这一困境表明，马克思那时候虽然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仍然受限于后者的理论框架。而等到他真正创建了自己的理论，意识到政治国家不过是市民社会的表现形式，这一公民浪漫主义也就随之消失了。“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的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sup>⑦</sup>

在以上两个例子里，马克思并不是因为受到浪漫派的影响才犯了错误，而是因为旧的理论框架内无法解决问题才不得已陷入了浪漫主义，而当他建立了新的范式，这些浪漫主义的迷误也就随之消失了。但马克思的确在他自己的体系中有意识地接纳过可能与浪漫派同源或相似的观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关于人的自由与感性解放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虽然也将自由与普遍性概念相联系，并从人的自我意识和意向性开始论述自由，但他更为强调感性是人的本质能力，并因此赋予了自由以不同的内涵。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人的自由的实现因此指向的是感性的解放，并最终体现为合乎美的规律的创造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sup>⑧</sup>在手稿的“笔记本 III”中，马克思也从审美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并设想了一个扬弃了异化从而实现了人的感性解放的美的世界。因为美学主题在马克思此前的文本中并未出现过，这一部分关于美的突兀讨论自然引人注目。这种认为人的自由的最终实现既不体现为内在的道德完善性，也不体现为外在的理性秩序（伦理的或政治的）的建立，而是体现在审美—艺术的创造活动之中的思想，显然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74页。

② 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聂锦芳、李彬彬编译：《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71页。

⑤ Peter Furth, *Phänomenologie der Enttäuschungen: Ideologiekritik nachtotalitär*, Frankfurt/M: Fischer Wissenschaft, 1991, S. 62.

⑥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8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

尔都有所不同。而马克思虽然援引了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但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同样缺乏类似的美学内涵。因此，对这一思想的来源的追问，很自然就指向了以强调审美和艺术著称的德国浪漫派，比如，麦克莱伦就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美学思想来自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sup>①</sup>，而维塞尔则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对席勒和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作了更多的比较<sup>②</sup>。席勒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德国浪漫派，但正如拜塞尔指出的，《审美教育书简》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圣书。<sup>③</sup>所以，如果麦克莱伦的溯源是正确的（虽然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那的确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与德国浪漫派具有同源性。当然，从外部批判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源自何处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这种相似性是否会为马克思招致跟浪漫派一样的批评？鉴于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仍在谈论自由个性的社会，在《资本论》中也谈论人的能力的自我发展的目的王国，很难说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人类学—美学的维度。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我们的确能找到一些与后来的马克思相似的观念，比如对感性的强调、批判现代社会的强制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化和碎片化等，但也能找到更多的差异和对立，甚至在这些表面的相似性之下也能发现更深层次的差异。

对于席勒而言，审美—艺术活动自身并非自由的表现或确证，而首先是通往自由的手段。只有通过审美—艺术教育，人才能培育出美的性格以调和自然性格和道德性格的对立，从而恢复天性中的完整性，“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理想中的国家才能成为现实，国家与个人才能达到和谐统一”<sup>④</sup>。审美教育在席勒这里实际上承担了类似于卢梭的公民宗教的教化作用，其目的首先是为理想的国家塑造合格的公民。席勒当然不会接受公民生活与市民生活的分裂，这有损于人的生活和性格的完整性。但在他看来，通过艺术最终可以超越和弥合现实生活的各种束缚和对立，“高尚的艺术不沾染任何时代的腐败，它超越时代”，因此理想的生活状态和理想国家的实现最终需要的是“勇敢的意志和生动的感觉”。<sup>⑤</sup>席勒也设想过美的王国，但这是一个只对个别审美主体显现的世界，它既不同于感性的物质王国，也不同于理性的道德王国，“在这里，人摆脱了一切（包括物质的与道德的）强制，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是它的基本法则，平等的理想得到实现。这样的审美国家实际上只存在于个别卓越出众的人当中”<sup>⑥</sup>。席勒的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德国浪漫派关于审美和艺术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观念，但后者刻意淡化了他对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的重要性的一定程度的认可，并夸大了审美—艺术活动的超越性，这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显然难以逃脱施米特的主体化的机缘论的批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艺术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席勒以及德国浪漫派，甚至可以说，他对艺术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摒弃了任何可能的浪漫主义基质。艺术并不是可以通达某个目的的手段，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并最终被现实世界的生产关系所决定，“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sup>⑦</sup>。也正因为如此，艺术才能表现和确证现实世界的自由，如果世界是一个普遍自由的世界，那这种自由必然会普遍反映为人的自由自觉的艺术创造活动。对于马克思而言，人的自由的实现必须在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展开，其受制于一系列在历史中生成的社会条件，所以像席勒那样认为希腊人具有性格的完整性的想法无非是对过去的浪漫幻想。在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不仅雅典城邦的公共生活必须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甚至那些在黑格尔意义上已经知道自己是自由人的雅典公民，因为作为人的本质的客观展开的对象世界的粗陋和扭曲，也不可

① 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李兴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

② Leonard Wessell, "The Aesthetics of Living Form in Schiller and Marx,"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37, No. 2 (Winter 1978), pp. 189-201.

③ Frederick Beiser,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 1790-1800*, p. 229.

④ 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218页。

⑤ 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42、246页。

⑥ 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36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8页。

能发展出全面而丰富的感性能力,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sup>①</sup>。德国浪漫派的思想中当然也包含有历史性的维度,但一方面,历史对他们而言主要表现为界限,因此浪漫派在政治上普遍趋向保守;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个体,尤其是天才,可以在审美—艺术活动中超越一切界限,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主体化的审美机缘论就此结合了起来。而在马克思看来,正因为人的历史性的存在,历史固然构成了人的存在和一切活动的前提,但历史自身的变化也会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新的可能性。推动历史变化的动力当然不是天才的创造性,也不是由政治和教育的艺术家所主导的审美教育,而归根结底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在审美视角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毫无浪漫主义的乡愁和感伤,因为恰恰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揭示了自由的新形态和人的感性解放的可能性:“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sup>②</sup>这当然不仅仅是——像麦克莱伦的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马克思的思想,同样的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更为精确的语言被复述了一遍:“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 and 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sup>③</sup>

马克思的思想中始终包含有理想性的维度,但它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的,跟浪漫派的理路完全不同。如果因为这一理想性而批评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有浪漫主义要素,这种泛浪漫主义的批评毫无意义。

(责任编辑:盛丹艳)

## Marx and German Romanticism

FANG bo

**Abstract:** There is recently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romanticism on Marx's thought. However, the related arguments are generally not very convincing. Except for a short period in his student years, Marx always held a consciously and unreservedly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the German romanticism, and consciously tried to eliminate any possible romantic element in his thought. The similarities in some ideas between Marx and German romanticism cannot be easily tracked back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r on Marx, it might rather originate from the same problems of their time, which they faced together but gave independently their respective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Given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regard of basic methods and beliefs, it is not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Marx was influenced or tainted by German romanticism simply because of the superficial similarities in some ideas.

**Key words:** Marx, romanticism, freedom, aesthetics, fantasy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2页。